# 魯迅家的傭人不受氣

文化什錦

霍無非

衆所周知，魯迅自小生活在一個封建沒落的大家庭，從他幼年到離世，家中都離不了傭人幫工，就算是與周作人「兄弟失和」，分家另過，大家變爲小家，與母親魯瑞及元配朱安在北京一起生活的三年，以及後來他與許廣平在上海共築愛巢，生下兒子周海嬰，傭人始終是他家不可或缺的一員。

早年，魯迅家的傭人是紹興鄉下的農村婦女，一九一九年冬舉家遷到北京後，家中的傭人幾乎還是來自江浙一帶，這樣從地緣上就有親近感，她們吃得苦，粗活累活做得來，裡裡外外一把手，大體能與僱主一家相安共處。魯迅像他的母親那樣，自小對家中的傭人是親密無間的，沒有頤指氣使的呵斥和歧視，他們朝夕相處，形影不離，在他數個「長媽媽」中，尤對矮胖的「阿長」感情最深，這在他的回憶性散文《阿長和山海經》中有所描述。雖然胖「阿長」愛饒舌，四肢張開的睡姿擠得他吃了苦頭，但她常給他講些鄉俗的宜忌，蘊含樸素的道理，不啻於啓蒙教育。特別是她關心少年魯迅的求知興趣，出乎意料地購回了他朝思暮想的書籍《山海經》，眞讓他欣喜不已，冰釋了對她除滅寵物鼠的前嫌，「她確有偉大的神力。謀害隱鼠的怨恨，從此完全消滅了」。並深情地發出心聲：「仁厚黑暗的地母啊，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！」「長媽媽」們善良、勤勞的本性感染了魯迅，成年後他也同情和善待家中傭人、人力車夫、烈士遺屬等底層勞動人民。

當然，魯迅一家善待傭人，和睦相處，並不是說傭人可以和主人平起平坐，兩者是有別的。她們做事要聽當家主人的吩咐，在北京八道灣大家庭時期，魯家當家的是二弟媳羽太信子，僱請了管家、燒飯司務、東洋車夫、打雜採購等多名傭人，揮霍鋪張，花錢無度，以致爲兄的魯迅看不下眼，出言相勸，招來怨恨，這應是與周作人反目並終生不再來往的主要原因。此外，傭人吃住也是要和主人家分開的。魯迅搬離八道灣後，家中有兩位傭人——王媽和胡媽，前者專門服侍魯迅母親，後者幹雜活。魯家有個規矩：傭人吃白飯不吃菜。因爲菜是朱安燒的，傭人怎能食之，主人每天各給她們四個銅板買菜吃，這樣看似苛刻，又在情理之中，生活上的事，魯迅盡量順着母親，由着朱安，是他不能完全左右的。

一九二九年九月，魯迅在上海當了父親，家務事驟多，僱請了同鄉農婦王阿花，王阿花年輕漂亮，愛妝扮，喜串門，帶孩兒的經驗和責任心都欠些，竟讓幼小的海嬰受寒落下哮喘的病根，老來得子的魯迅卻沒責怪她。王阿花是怕被有病暴虐的丈夫賣掉而離家的，丈夫得知她逃到魯迅家，派人來追蹤，準備把她劫回賣掉，魯迅背負「強佔女人」的惡名，毫不膽怯，挺身而出，把這一干人擋在門外。與專此而來的鄉紳談判時，嚴正指出賣人是現在不允許的，最終，他仗義地掏一百五十元心血錢，幫王阿花贖了身，恢復了自由，甘當「冤大頭」，讓她獲得新生。以後，魯迅家又僱請了許媽，許媽不僅體壯能幹，心腸也好，當小海嬰患痢疾需禁食時，她看不得孩子捱餓，用私房錢悄悄買來餅乾，藏在別人家，偷着給他吃幾塊。她帶小海嬰到野外玩耍，捉螳螂，有時玩餓了，她就掏一兩個銅板買點「老虎腳爪」、「麻油鏾子」等揚州提籃點心給他充飢……直到魯迅病逝後，她才離開上海返回南通鄉下。十年後，念舊的許媽滿頭銀絲，步履蹣跚專程來上海看望許廣平母子，見周海嬰已長成一位帥氣的初三學生，百感交集，心才釋然。試想，如果魯迅夫婦當年待她不好，是沒有這份感情長途跋涉故人重見的。

魯迅對同胞的「劣根性」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，在不少文章中予以揭示鞭撻，家中的傭人有沒有他所指的「劣根性」呢？她們生於其時，不可能獨善其身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，譬如說，愚昧迷信不知求眞，把不住嘴撥弄是非等，但魯迅對她們網開一面，筆下留情，他的文章沒有對這一類大字兒不識的「下人」嘲諷挖苦，筆鋒觸及的往往是當權者或是一些和他有過節的文化人，這不能不說是魯迅平民觀的體現。

# 周恩來的魅力

童德昌

往事鈎沉

周恩來，我國的一位傳奇式偉人；一位不可無一的大管家；一位難得享譽國際的卓傑外交家。他不僅以瀟灑、莊重、練達、忠篤的風度令人欣賞，更是他能面對任何巨細複雜事宜，具有處理得至善至美的魅力。

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，他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，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走上了講台。於審時度勢之餘，在讀稿前，他以內在美德和海涵的氣度，琅琅一句「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。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。」這一聲至誠、簡約、明快的宣告，讓與會的亞非朋友們聽到了中國之音，頓時將全場不同政見代表們的紛議嘈雜氣氛調和有序。代表們無不爲之在理解中讚嘆周恩來的超凡魅力。

周恩來托着中華尊嚴與友善的國風，在特定時空裡，睿智閃光，思路敏捷，言簡意賅，鎮定了一方乾坤。周恩來復興中華的這一巨舉已成了世人的可頌口碑，令子子孫孫仰慕不已且獲益匪淺。正如一個政治家所出的妙語「生活沒有綵排的機會，有時不得不即興發揮來演好每場戲。」

周恩來何嘗是在大事巨節上處理得讓人折服，即便是平凡生活裡與國際友人相處中，他所展現的知人知心之細也無不令人嘆佩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周恩來與越南領袖胡志明在武漢相聚，老友欣晤不免有些懷舊，周恩來設宴招待胡志明。飯後，胡志明環顧四周似欲求索一物，未達。這一細小動作被周恩來覺察到了，他即從上衣胸袋裡取出一根用小紙袋包裝的精美牙籤遞上給胡志明。這一早有準備的周到細舉，實使胡志明出於意表而驚喜地說：「你記性眞好，還記得我要用牙籤。你眞是個了不起的人。」其實，周恩來的處事是時時處處巨細着意而善解的，尤是對胡志明這樣的老朋友，周恩來更是熟諳其生活習慣。面對胡志明的讚佩，周恩來微笑作答：「我不過是中國的一個勤務員罷了。」

周總理的細舉且止在關心老友，同樣也着心與周圍友人。一九六三年冬，周恩來總理由陳毅副總理陪同，率中國友好訪問團出訪亞非歐十四國。所抵達的第一個國家便是埃及（那時稱之謂阿聯）。

那日抵達埃及首都開羅正是烈日當空的中午。納塞爾總統派他的代表薩布里主席以及許多高官到機場歡迎。熱烈場面自不必說。

埃及，向以悠久的文明歷史著稱於世，金字塔、獅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化高度發展的標誌。

周恩來總理所率代表團一行由埃及官員陪同，來到一方方巨石壘疊而成的金字塔下，見幾名身着白色衣衫的登塔表演的運動員已等候在塔下。不經意間，運動員已連跳帶躍地上了金字塔。只見那一朵朵白色衣點在金字塔上輕捷跳動。周恩來和陳毅摘下墨鏡，也仰頭欣賞着運動員的快捷攀登的矯健身手而不時頷首。不大功夫，白衣點已上了塔尖。旋即，白衣點又折返下塔。運動員們在彈彈跳跳的瞬間回歸地面，人們的掌聲打破了沙漠的驚愕與沉寂。

周恩來快速上前和氣喘吁吁的運動員們一一握手，笑着對他們說：「你們身手不凡啊！七分鐘就在一百四十六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個來回。」原來，當人們不經意間，周恩來就很細心地當上了「裁判員」，看着手表記下了運動員起攀和着落地面時間。周恩來還拉過一位運動員的手，看着手表，像中醫號脈似地號着運動員的脈搏。一分鐘後，周恩來驚奇地說：「哎，還眞臉不改色『心不跳』，和正常人跳的一樣，八十多下。這就叫生命在於運動啊！我們不運動有時心跳不正常哩。」一句話讓大家笑了起來。

周恩來總理巨細兼顧的外交而今更成了人們的佳話美談。

一九七二年二月，尼克松總統訪華，結束了中美幾十年的相互敵視的歷史。周恩來以「不卑不亢」中國之尊，華夏之重的姿態，在中美兩手相握之際，周總理把握分寸，於提手遲秒之間又見這位偉人睿智——當尼克松的專機着落地面，艙門打開，首現在艙門口的是滿面笑容的尼克松，緊跟其後的是他的夫人。

尼克松在快速的腳步中下着舷梯，時而招手時而鼓掌。一隻腳剛落地，手就筆直地伸向二三米外的周恩來。

周恩來不卑不亢，面帶笑容，等待着這雙從太平洋彼岸伸過來的手。就在雙方即將握住手前的剎那間，周恩來總理才以慢半拍的節奏平靜地提起了手去握尼克松的手。此刻，周圍的一百多部相機發出了爆米豆似的脆響……

▲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周恩來總理與越南領袖胡志明（左）在武漢相聚

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周恩來總理（前排左三）在埃及參觀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

# 小鎮皮卷

范申

飲食男女

千年的小鎮流淌着悠遠綿長的古意，這裡的民居依舊是青青的磚烏色的瓦，雕花窗、橘子門脫不了古色古香的影子。在青石蜿蜒的小鎮北街，有家很不起眼的熏燒店，經營着一樣美味熟食：皮卷。在蘇北的里下河地區，人們都將滷製的豬頭肉、燒雞等家常熟食稱爲熏燒，皮卷便是這蘇北小鎮獨特的熏燒品種。這是一種做成了磚形的塊狀食品，焦黃的外表泛着油光，用刀將皮卷切成片狀，便露出了肉紅色的內餡，吃上一片，有肉的滋味，麵的清香，五味滷製的綿爽，極是下酒的好菜。

熏燒店的主人姓王，五十開外的年紀，問起他這皮卷的來源，他只道是他父親輩傳下來的，想來該有數十、上百年的歷史了吧。做皮卷，須用烤得黃燦燦的草爐燒餅作爲原料，這種燒餅不包餡，小鎮人稱爲實心燒餅，它用當年新磨小麥而成的麵粉發酵，燃茅草烘製而成，極富天然的原味。用手將燒餅掰成小塊後置於清水中稍浸泡，餅成厚實的糊狀，後撈出擠乾放於面盆，這時將切成丁狀的五花肉、葱、薑、鹽、味精等一起拌與其中，主人家依自家風味再放秘製調料和粉芡，精細的人家可放點蝦米、筍丁等，這便成了做皮卷的餡料。包皮卷的皮子須用小鎮老店的豆腐皮，口感好而有勁道，油黃色的皮子漿濕軟平即可包起調好的皮卷餡，做成塊狀的皮卷。

在老店的門口，支着一口油黑發亮的平底鍋，這是用來煎炸皮卷的。青煙繚繞之中，皮卷的外表已成了焦黃。這時的皮卷尚是半成品，還要進行最後一步的工序：將這半成的皮卷放入廚房的一口大鍋中進行蒸煮。鍋中陳年的滷湯豐富滋味，愈久彌香，可常年使用，平時只須加些鹽、水、八角、茴香等。在用柴火燒煮約一個小時的光景後，皮卷便可出鍋售賣了。

兒時，我與爺爺、奶奶一起在小鎮生活，該是伴隨着對皮卷的饞涎而長大的。那時小鎮的熏燒約在午後三四點鐘出攤，魚市街、北大街、磚橋口各家熏燒攤的白色瓷盤都有碼得整齊的皮卷售賣。皮卷價廉而物美，很受老百姓的歡迎。老街的居民把皮卷當作了家常的菜餚，趕集回家的鄉下媳婦會買上兩塊給辛勞的男人開葷，我的奶奶也時常買上一塊皮卷來驅趕一下我肚子裡的「饞蟲」。小鎮東窰廠的上海人也喜歡吃皮卷。那個被我們稱爲阿寶的上海知青，常見他在大街上一手托着用荷葉包好的皮卷，一手已性急地從中扒出幾片塞進嘴中大嚼起來，他穿一身已經掉了色的綠軍裝，夕陽之下，留給了我一個彼時的他快樂的背影。我家的鄰居朱爺爺喜愛喝酒，傍晚的時候，朱爺爺坐一張小橈，面前條橈的一首，排放着一小盤切好的皮卷、一把酒壺、一隻酒杯，一雙筷子總是握在手中。朱爺爺吃兩片皮卷，抿一口老酒，安詳的時光中，也因有了皮卷而更加有滋有味了。

小鎮是古鹽運的集散地，這裡曾嘯聚過後來威震江南、稱王蘇州的張士誠的十八條挑鹽扁擔，留下傳奇名篇《桃花扇》的孔尚任也在此寫下了詩歌《宿白駒場》。如今，風風火火的前塵往事在小鎮已不見當時的印記了，小鎮經歷了繁華，也安守着寧靜。我在小鎮轉了一圈，做地道皮卷的恐怕也只有這王家老店了。此時是午後的時間，風也輕柔，雲也淡遠，王家的皮卷已做好出鍋了，還是那樣靜靜地碼放在了白色的瓷盤裡，油亮的皮卷溫潤着不曾改變的鮮美，空氣中也瀰散開了熟悉的滷香味，古老的石板街上又多了分家常的煙火氣，小鎮人的生活也就這樣延續着這種閒適與暖意。這時，有笑聲傳過，我猛一回頭，是嬉鬧的孩童從熏燒店門前跑過。呵，她在不經意間，已把自己的童年與小鎮一起留在歲月的深處、記憶的深處了。

# 美國國慶晚會

東西走廊

今年美國國慶日在華盛頓的慶典活動的場面和內容，和我們歷年看到的，沒有什麼區別。在電視機前觀看過程中，老伴和我多次交流觀感，不由自主地把他們的活動和我們在國內看到的作對比。

慶典活動在白宮前方到國家紀念碑、林肯紀念堂那個狹長的空曠地帶舉行。粗略估計，容納的人數，跟天安門廣場能容納的差不多吧。觀衆和表演者有一定距離，當然看不清、聽不清，好在設有很大的屏幕和擴音設備。六十二年前我在北京機關工作，國慶上午參加天安門前的遊行。隊伍經過天安門時，看到站在天安門城樓中央的，輪換成劉少奇。晚上參加群衆在廣場上的晚會，同一個單位的圍成一圈，跳集體舞或交誼舞，直到午夜。後來在紀錄片上看到，此時中央首長和貴賓正在城樓上圍桌而坐，品茗交談，觀看廣場上的活動，在城樓上的人自然是群衆活動的中心。我們會覺得這樣很正常。但美國國慶晚上的群衆活動，在類似天安門廣場的環境中舉行，老伴問此時奧巴馬和他的閣員們在哪裡呢？我答，奧巴馬必在白宮陽台或窗口前，更可能跟我們一樣通過電視觀看表演，群衆歡慶並不以他爲中心。這有點像我們的「春晚」，觀看演出的對象是老百姓，根本不以美國總統或我們的黨政領導人爲中心。

電視攝影鏡頭對準群衆場面的多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未必能看到這麼多不同年齡層次的美國人。他們膚色不同，老伴和我從他們的面容上還可以區別出身爲日本人、韓國人和中國人的。美國人（無論是白人或黑人）最明顯的共同特徵是胖。我在當地超市中見到的，也都胖。我還以爲我們這個寒帶地區的人胖，是出於生理上有「儲肥以備過冬之需」的動物本能。從美國國慶晚會所見，實際上全國都胖，那是肉食多、營養豐富（是不是過剩了？）的結果。各色人種雜處，看得出他們之間關係融洽。美國人中在白人和黑人之間至今猶存的矛盾和差異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。南北戰爭以來，經過一百多年許多鬥爭和犧牲，才達到今天的局面，很是不易。老伴在我旁邊看到各色人種融洽雜處的場景，多次喃喃地吐出「包容」兩字。做到融合到這個程度，已經很不容易了。

樂隊中有幾個中國面孔，出於「故國情懷」，引起我們特別注意，而且暗暗希望多見到一些。每當鏡頭聚焦到一個中國面孔時，老伴就會捏我一下，彼此相視而笑。出身中國的鋼琴家郎朗屬於新移民，這次在晚會上與樂隊合作演出了美國作曲家喬治・格什溫著名的《藍色狂想曲》，是個「重頭戲」。郎朗的演技確屬第一流，但在他入籍之前美國未必沒有及得上他的鋼琴家。現在讓他這個新移民擔任這個重要的節目，使我想起在宣誓入籍的儀式後，領誓者說的第一句話：「從現在開始，你們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，成爲我們的一員了。」從朗朗的入選，可見不因入籍先後而有任何歧視。但我們似乎不能想像，一個外國面孔的新移民藝術家，也能在中國如此隆重的慶典上，同樣出盡風頭。

晚會以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《一八一二前奏曲》殿後，這種安排更不可思議。這不但因爲柴氏是個俄國作曲家，而且此曲主題所弘揚的是俄國人的愛國熱情，描繪的是拿破侖趾高氣揚兵臨莫斯科又最終潰退的故事。我們的春晚，用《難忘今宵》結束。該曲專爲春晚準備，純屬「中國製造」。我不能想像，「春晚」會以外國作曲家、宣揚他國人民愛國熱情的曲子來結束。

凡此種種，是不是都可以用「包容」兩字來概括呢？

楊繼良

# 不要小看「口述史」

如是我見

嚴陽

近年來，不少民間人士在着手爲抗戰老兵記錄「口述史」。比如說，志願者賴子靠工資支撐，五年間爲七十多位抗戰老兵錄製「口述史」；在其受訪的人中，有「南京受降儀式親歷者」趙振英等知名老兵。而稍早一些，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拍攝的紀錄片《我的抗戰》，也是具有「口述史」性質，但影響無疑更大的是對這方面的有益的工作。有報道稱，爲拍這部片子，崔永元採訪的對象超過三千五百人，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與紀錄影像均超過了兩百萬分鐘，收集的歷史老照片則超過了三百萬張。

讓人十分遺憾的是，對於此類「口述史」，有些人不以爲然，以爲其眞實性大可懷疑，其價值自然也非常有限。爲證明這一點，他們舉出了盧梭的《懺悔錄》的例子。在這部自傳體著作中，委實盧梭在對不少人與事的回憶中，不夠誠實。比如說，盧梭的情人華倫夫人，曾經在盧梭最困難的時候給予他巨大的幫助，但盧梭在《懺悔錄》中，對她的態度卻很不恭敬，也有很多有損其形象的無端的猜測；對於將自己所有的孩子統統送進了育嬰堂，沒有能夠承擔起做父親的義務，他也並無多少愧疚，更談不上痛苦，而僅僅以「我自己無力撫養我的孩子」爲自己開脫責任。

人是有感情的，也是有立場、有思想的，所以，假如在「口述史」中一定程度上爲自己「隱惡」，或者一定程度上「美化」，並不是不可理解的事。但是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，就眞實性、客觀性來說，「口述史」之外的其他歷史敘述方式，比如說官方所修的歷史——一般也被稱之爲「正史」，其可信度其實未必就一定在「口述史」之上。爲什麼？因爲官方同樣也會有官方的立場、觀點，所以，爲某個政黨、集團、人物「隱惡」或者「美化」也是十分尋常之事。比方說，前蘇聯官修的《簡明聯共布黨史》，在涉及布哈林、托洛茨基等人的問題的時候，一些內容的眞實性就大有問題，並且已經被證明。

就中國人民進行的那場持續時間爲近代歷史之最的抗日戰爭來說，從前的史家和史冊所反映的那段歷史同樣也未必那麼可信。而在拉開了一定的時間距離，人們能夠冷靜下來，排除一些感情因素的干擾，比較客觀地對待這段歷史的時候，有些提法就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。比如說，對於正面戰場的作用的認識就逐漸趨於客觀；對於無論哪個黨派的軍隊在抗戰中所付出的犧牲、所做出的貢獻的認識同樣趨於理性。這些變化，假如能夠在官方修訂的「正史」之外，有屬於個體性質的「口述史」的補充，那麼，無疑會更加完善，也會讓我們無限逼近歷史眞實。

作爲個體的人，尤其是作爲軍隊的最基層的普通士兵，他們的視野委實遠遠沒有那場戰爭中運籌帷幄、決勝於千里之外的那些高級軍官與政治領袖那樣開闊，對於那場戰爭的全貌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少了解；但是，他們對於發生在局部的、具體的戰鬥，對昔日從他們身邊倒下去的戰友，以及與他們面對面地血拚的對手的認識和了解，大概又是前者遠遠不及的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對於那場戰爭的，顯然只能是偏重於具象的回憶，恐怕比之書本上的抽象的數字來得更生動、更鮮活。而這一個個屬於個體的回憶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的觀察、思考，集合起來，是不是可以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畫面？是不是也是很有價值的一種歷史？

我們這個民族有很多優點，但無疑也有不少缺點；而缺少腳踏實地的精神，總是習慣於馬馬虎虎、滿足於「大概」與「可能」之類，應該說便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無論是海峽哪一邊的國人進行這樣的「口述史」的整理和研究，都值得誇讚，都值得提倡。如此這般，我們的抗戰史方才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眞實。所以，不要小看「口述史」，而應高度重視「口述史」，並且讓它在歷史的還原和整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